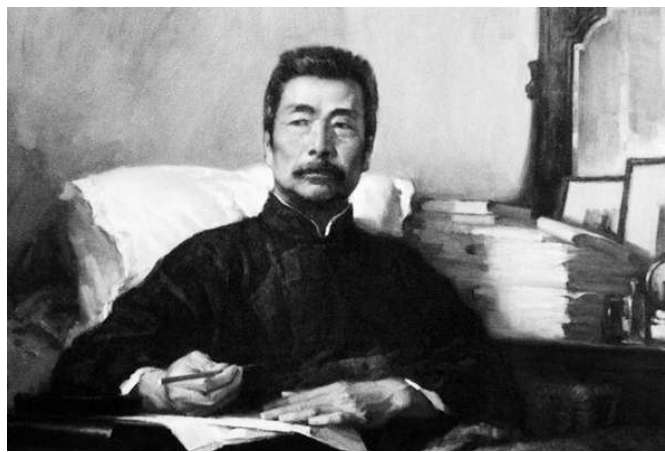


大家小说

鲁迅的侠骨与柔肠

钱念孙



鲁迅画像

灵世界，只能挂一漏万地谈谈他的侠骨与柔肠，以从一个侧面略显其神采。

二

所谓侠骨，是指见义勇为、当仁不让的性格和气质。《水浒传》电视剧里《好汉歌》唱词“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以及人们常说的“仗义执言”“拔刀相助”等等，大约体现民间大众对豪侠义士的看法。

鲁迅年轻时就确立积极人世的人生态度，颇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侠骨义胆。他21岁留学日本，曾写下“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篇，誓言要唤醒和改变风雨如磐的“故园”，为自己深爱的祖国，即便献上鲜血生命也在所不惜。这首诗，即鲁迅以笔为剑刺破笼罩中国夜幕的先声，表露他年轻时确立的人生目标和志向，为其毕生执着追求、不懈奋斗奠定了基调。

作为中国新文学创作最具实力和实绩的主将，鲁迅的豪侠义举首在以小说和散文为武器，向封建“铁屋子”发起勇猛冲击。他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白话小说，更以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揭露封建社会“吃人”本质，控诉宗族制度和传统礼教对人精神的戕害。他随后“一发而不可收”创作的《孔乙己》《药》《风波》《故乡》《祝福》等系列作品，尤其是1921年在《晨报副刊》上连载的《阿Q正传》，通过对社会底层被压迫、被剥削穷苦大众的描写，将他们不幸的生活遭际、麻木的精神状态、悲凉的命运结局和盘托出，生动而精准地刻画出当时国民的魂灵，寄寓了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情和愤懑。他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里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如果说，鲁迅小说是驱散社会阴霾的长枪大炮，那么，他的散文则是刺向旧营垒的匕首投枪。翻开鲁迅十多本杂文集，犀利的评论、无情的批判、不屈不挠的论战，“对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和抗争”（《且介亭杂文·序言》）的锋芒英气逼人。他在《纪念刘和珍君》中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这里刻画的“真的猛士”的形象，可以说鲁迅作为文坛斗士，为民族和社会改良进步“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精神写照。

更为可贵的是，鲁迅不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1925年5月“女师大风潮”升级，他起草《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发表在《京报》上，支持学生正义斗争，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除教育部参事职务。1926年3月“三一八惨案”发生，他撰文抨击段祺瑞政府屠杀学生的罪行，遭追捕后不得不远赴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4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他以中山大学教务主任身份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营救被捕进步学生，遭遇阻拦而愤然辞职。1931年1月“左联”五位青年作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杀害，他不仅义愤填膺地吟出“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诗句，还写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等多篇无产纪念，尽管面对受牵连遭追捕的威胁仍无所畏惧……

如此等等豪侠义举，在鲁迅可谓指不胜屈。以其对世事的洞明，他完全知晓做此类事的后果，也完全可以躲在象牙塔里为学术而学术，或安心在校园里教学和写作。但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目的如其《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所说：“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让中国及青年一代向着“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正是有着这样坚定而崇高的信念，他临终前在《死》这篇带有遗嘱性质遗嘱的最后，以豪侠义无反顾的语气写道：“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说：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三

不过，鲁迅绝非只有刚毅、冷酷、严峻、硬气的一面，他作为眼光深邃和情感丰盈的文学家与思想家，也有宽和、热情、怜悯、柔软的一面。并且，其柔肠百转的细腻和情深，与其侠肝义胆的刚强和勇毅一样鲜明突出，恰如江河水流，既能汹涌澎湃，又能平缓如镜，只是因时因地不同却又源自一体，既彼此衬托又相互为用。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对人对事责之深，往往是因为爱之切；而对其爱之切，

则多半会责之深。鲁迅诗词里许多夫子自道的名句，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等等，无不深切感人地呈现了他兼具侠骨与柔肠的人格和性情。

与鲁迅颇多交往的著名记者曹聚仁，在其1956年出版的《鲁迅评传》里记载这样一件事：鲁迅和弟子孙伏园一次到陕西讲学一个月，得到三百元酬金，鲁迅和孙伏园商量：“我们只够旅费，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随后，鲁迅得知陕西西易俗社经费紧张，就决定将这钱捐出去。西北大学的工友照顾非常周到，鲁迅也决定多给他们一些酬劳，但其中另一位也来讲学的朋友不赞成这样做。鲁迅当朋友面没说话，退而对孙伏园讲：“我顶不赞成他说的‘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来’的话，他要少给，让他少给好了，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从这件平凡小事一波三折的细节上，足见出鲁迅不仅对人对事具有深广的同情心，而且精神上保持洁身自爱的高洁品德。

鲁迅的柔肠百结，还特别表现在他对青年文艺家的扶持和友谊上。他1925年发起成立未名社，热情推介韦丛芜、台静农、李霁野、韦素园等初出茅庐文学青年的作品，在文坛传为佳话。萧红、萧军、叶紫、艾芜、徐梵澄等青年作家遇到迷茫和困难，冒昧向心仪偶像鲁迅求救。他尽管异常繁忙，还是抽时间与他们通信和会面，为他们的作品写序并帮助出书。萧红、徐梵澄等人的回忆文章，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鲁迅高大形象的亲切与温暖。尤为凸显鲁迅为人诚挚和深情者，当推他与瞿秋白的交往，以及瞿秋白死后鲁迅为祭奠亡友而表现出的超凡绝尘的风仪。

鲁迅与瞿秋白1932年才在上海某面相会，但交谈之下，心心相印，彼此都相见恨晚。1933年盛夏，瞿秋白选编一册《鲁迅杂感选集》，撰写一篇洋洋洒洒一万七千言的序言，第一次对鲁迅及其杂文做出客观、准确、全面的描述，对鲁迅的创作历程和思想演进轨迹，做出清晰的梳理和精当的分析。鲁迅作为变革时代创建新思想和新艺术范式的新一代高才，时有单骑绝尘、知音难觅的孤独和寂寞。他读了《序言》，仿佛俞伯牙遇到钟子期，大有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动。欣喜和快慰。他压抑不住自己的兴奋，挥毫写下一幅饱蕴深情又别具境界的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赠送给瞿秋白。

1934年初，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奔赴江西苏区工作，临行前特地到鲁迅家中道别。鲁迅见其家况，心碎到深夜，坚持留其在家过夜。他执意将床榻让给年近小20岁的瞿秋白，自己睡在地板上，以表尊重和惺惺惜惜之情。谁料此次惜别竟成永诀。1935年2月，瞿秋白转移香港的途中，在福建汀江被捕，6月18日高唱《国际歌》于刑场慷慨就义。噩耗传到上海，鲁迅悲痛欲绝。他跑到冯雪峰家里激愤地说：“我决定编一本秋白的作品集，作为一个纪念，一个抗议。一个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

此时，鲁迅的肺病已经比较严重，离其1936年10月去世仅一年多时间。但他抱着痛痛之躯，把瞿秋白的翻译文稿一一整理，编选出两大卷近60万字的《海上述林》，以诸夏怀霜社的名义出版。“诸夏”指全国民众，“霜”取瞿秋白原名瞿霜之字，“诸夏怀霜”即寓意全国民众怀念。《海上述林》编妥后，许多印刷厂怕惹麻烦不敢承印。鲁迅找同乡老友、开明书店经理章锡琛帮忙，在开明书店的美成印刷厂打出原型，然后托友人内山完造辗转送往日本东京印制。此书用重磅道林纸精印而成，配有玻璃版插图，以皮革覆书脊，书名烫金，极为精美，上卷面革不久，鲁迅就逝世了。

鲁迅晚年在上海，高强度不间断写作所得稿费及版税，是其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可说每一个铜板都是其呕心沥血的结果。《海上述林》不论是编选校对、装帧设计，还是购买纸张、联系印刷，包括广告拟定宣传等，全是鲁迅亲力亲为，一手包办。这不仅需要承担不小的经济压力及费用，更需要耗费大量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对于一位重病缠身、不久于人世，且肩负家庭生活重担的文人来说，如此付出意味着什么，鲁迅自然心知肚明，却知其不宜为甚或不可为而拼力为之。这种几乎是赔上身家性命不图回报为祭奠一个逝者的奉献，世间凡人能够做到？嗟乎！古有季札挂剑之美谈流传青史，今有鲁迅为亡友编书之佳话谱写厚篇，其“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深情和厚德，能不令人感慨哉！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边走边写

好一派风华正茂

何冀平



何冀平

接到国家京剧院的邀约，要为建党百年创作一部京剧，时间是2020年9月，预定来年7月上演，时间很紧。此时，也是全国各艺术院团，为庆祝建党百年创作新戏的时候，有些筹备早的，已经上演。类似的题材很多，这一部京剧，我要从什么角度切入？我曾经写过电影《决胜时刻》，讲述1949年春，中共中央住进香山双清别墅，指挥渡江战役，推翻旧政权，解放全中国。为这部电影，我翻阅了大量史料，尤其关于毛泽东。

开始创作了，我开始倒着想。时光回溯到102年前，那个时候，20岁出身的毛泽东是一个聪明大胆、好学上进的有为青年，他充满活力，为救国救民，上下求索寻找真理，正如同逆境崛起的中国共产党，也正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恰似百年风华正茂。

这次的创作不同以往，因疫情我哪里也不能去，就靠手头一些资料和香港图书馆的有限书籍，写好剧情，主要是写好人物，我一贯的方法也是从人物入手，虽然是伟大的红色经典人物，一样要有血有肉，可以触摸，不需仰视。24岁的毛泽东，为寻求真理上下求索，他求教师长，携手同伴，四处奔波，暑雨祁寒，同时记挂亲人，萌发爱情，是儿子、恋人、丈夫、兄长、同伴、学生、斗士，他有胆有谋，有情有义，有浓厚的情感，有高昂的斗志，率真活潑，谦逊不失分寸，恭敬不失原则，有胆魄有气派，一个鲜活的领袖形象，渐渐在我脑

中笔下活跃起来。

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毛泽东也走过弯路，尝试过各种救国方法，在挫折迷茫中不舍追寻，直到找到光明。就像他自己所说：“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理论上到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剧中还写到李大钊、陈独秀、杨昌济，同学同伴邓中夏、蔡和森等中国早期革命家，以及毛母文七妹，妻子杨开慧，兄弟毛泽民、泽覃、泽建，楚雄（毛泽东侄儿）和毛岸英，毛家五位为国牺牲的亲人。

题材的原因，虽然是文学艺术作品，必须依据史实，剧中情节、事件做到皆有出处。根据这段时期的历史

人生撷英

展时代风采 绘辉煌伟业

邵大箴

欣赏曹元升先生的山水画后，我有种心灵震撼的感觉。他的作品以巨幅大幅居多，从构图上可想而知其艰巨。他在造型和笔墨运用上，精练娴熟，一丝不苟，足可见其作画之用心程度！他的山水画中融入了自然、典雅、清奇、清幽的元素，幅幅作品大气磅礴，千里河山都浓缩在有限的空间里。他在画面的传统格局中，加强了对自然山水的主观意识，善于在平凡的自然界中寻求美感，使他的作品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时代性。他注重用墨的浓淡干湿变化和用笔的柔滑滞涩变幻，力求对比统一，达到意趣超逸、笔简意赅、笔精墨妙的效果。其笔下的山峦、烟云、苍林、清泉、山川、村舍，无不体现着“禅意”和“玄趣”。观赏曹元升先生的山水画，吞吐江河的磅礴之气扑面而来，使观者心怀坦荡，宛如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

生活是一切造型艺术创造的源泉，离开了生活，艺术就离开了根，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观察曹元升先生的山水画不难看出，他的作品都来自生活，来自亲身体验的大自然。中国画重视的是概括、明确、变化以及灵动的神情气势。泉水潺潺，滋润心灵，他把大自然的山川精髓和灵气，融汇到山水画中，把情感与艺术的关系衔接到位。他不以简单的“形似”为满足，而是用高度提炼强化的艺术手法，表现经过他深思熟虑处理加工过的艺术的真实，迅速灵活地捕捉物象形象。他的墨色枯湿浓淡之变，既极其丰富复杂，又极其单纯概括。从艺术性来讲，用色力求单纯概括，更有自然界的真实色彩所不及处，这是画家独创的一面。

曹元升先生作画很讲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在自然中陶冶、追索、领悟，取之自然，妙造自然。画中彰显出静寂、空旷、淡远的意境。画面构成简练、疏朗、精致、洁净、气韵贯通；色调清淡飘逸、清冷幽远、潇潇洒洒、寓意高洁，神韵犹至，使人品读到一种高妙的意境寄托，达到了物我两化的境界。

曹元升先生笔下山水画风受大

师影响，传统功底深厚，山水画师宗北派，旁及南派，广采博取，画风多变。他长于骨法用笔，笔触力度刚劲凝重，洋溢着灵性及活力。作品《天下黄河富宁夏》内容丰富，构图新颖，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悠然恬淡、神韵飘逸的画中境界。他巧妙地运用色与线，意在笔先，表现黄河两岸繁茂的景象；用浓而不浊的墨色烘托出八百里宁夏平原青山绿水的明洁意境，可谓别具风格。

中国画的精髓是画家把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传达给观众。因此，曹元升先生作画时总是“感情用事”，用强烈的感情去感受生活，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画家用真挚的感情、饱满的激情以及浓郁的兴趣投入他的绘画创作，同时把西画的形、色、明、暗运用到中国山水画中，又把前辈的冷暖观、动静观、面面观、上下观、表面观、以大观小、以小观大、无所不观也融进了山水画里，可谓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了！其作品真正做到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借景抒情的妙妙境界。

曹元升先生的山水画笔调纵逸、墨色清淡、构图清新、俊逸多姿、气势郁勃，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其用墨设色清隽雅逸，深具烟云飘渺、泉石洗滌之致韵的江南山水之风貌；而山势绵延、构图宏伟、气势磅礴、瑰丽壮观又显示出北方山水的苍劲和峻拔的风骨。纵观他的作品既有传统山水画的神韵，又透出强烈的现代气息；既注重作品的深度力度和艺术质量，又呈现出山川地貌的生动气韵，比较深刻地展现了画家的艺术个性和时代风采。

中国画强调诗情画意，将诗书画印视为一个完整的艺术体系。画面要求丰富而有变化，体现中国画特有的形式美，它可简单地概括为：以情观景、以理观景、以心观景，这些在曹元升先生的山水画中有着独特的彰显。他的山水画富含诗意和情趣，有一种飘逸超脱的风神。画中郁勃的气势和充盈的时代感，融合着天人合一、兼收并蓄的气息。线条刚柔相济，作品题材广泛，创作有感而发，把人们带入身临

实，剧中出现的事件、人物、场景比较多，结构上，我采用了歌队的形式，歌队是西洋歌剧的说法，戏曲称为帮腔，在地方戏曲中比较多，京剧中用的不多甚至没有。所谓歌队不是台上站两排合唱队，他们要随着剧情随出随入，扮演剧中人物，参与对话议论，渲染舞台气氛，衬托演员唱腔，调节时空转换，推动剧情。

我是写话剧出身，也曾写过京剧剧本，深知两者不同。好听的唱段是戏曲的魂。写唱词，对我来说是挑战也是乐趣。而这次的唱词有所不同，毛泽东有浓厚情感、诗人情怀，文字功底，他的唱词一不能“水”，二又不能太过华丽深涩，要带有文学色彩和浪漫诗意，涉及的李大钊、陈独秀、杨开慧，都是文人革命者，都要走有情有义有韵味的风格，而毛母则要有大义有慈母情。

3个月内我拿出初稿，基本得到剧院的认可，随后一系列的应有程序，全靠线上交流，三稿定稿，进入排练。导演宫晓东是我的中戏同学，虽然我们首次合作，但他非常理解剧本和我创作的原意，观念上的一致和统一，推动排练迅速展开。国家京剧院倾全团之力，汇集各路精英，全青年班底加一级演员上阵，真如同剧名风华正茂。

可惜的是因为疫情，我不能身在排练现场，不能感受其中的艰辛，不能看首演和演出，这在我创作生命中是平生第一次。

（作者系著名编剧，作品有话剧《天下第一楼》、影视剧《新龙门客栈》《新白娘子传奇》《明月几时有》《决胜时刻》等。）

其境的境界。他力求通透传统，强调创新。山水画最具特色的当是各种皴法的运用和创造，他从自然界的真山真水中提炼出一种独特的山水皴法：一笔皴、又叫颤笔皴，一笔下去，勾、皴、点、染一步完成，山之态势立现纸上，并通过层层积墨使山体厚重而滋润。他把文人画的恬淡美与现代意识相融，以传统笔墨精神与写生作品相吻合。通过泼墨泼彩，注重干与湿、浓与淡的运用，用点、线、面将水墨发挥到极致，并兼收各类画种之精华，使画面严谨明快、秀润纯净，极具诗意和美感。

艺术是感情的交流，情是艺术创作的首要条件，情又是艺术创作的最终目的。只有情的升华才会产生创作的动力，才能产生艺术作品。真正好的作品就好像在情之真切。画家几十年笔耕探索，几十载观山沉思修练，积淀了平生的修养和学识，一朝厚积而薄发，情浓而意重。曹元升先生具有洒脱严谨的山水画，老社激越的情怀。他深深悟出了中国山水画之真谛。他的成功，除了天分、勤奋、见识、经验、环境以外，不可或缺的是有赖于他对中国传统山水真正内涵的理解和认识，蕴含着不可见而可感的内美——机趣和神韵。他从不同的审美角度和艺术观为其作品注入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现代元素。其笔下的山水传达出气质俱盛、神情逼真、气韵生动的美感。用传统的笔墨功底加之现代审美意识的思维，经过长期反复的探索、实践、尝试和创新，使他的作品赋予了现代山水画的永恒精神，注入了新的时代气息，达到了一种宁静致远的境界！其独特的表现形式构成是他心灵对世界与自然的独特理解和感受，并通过特定的语言阐述自己的情怀与理想。曹元升先生作品最根本特征是形式与内容的共美！艺术是真、善、美的载体，这是艺术的价值所在，也是情之所在。落花无言，人淡如菊，这正是他的人格品质和追求的理想境界。在他的山水画中，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以境界的营造融入了他的思想和情怀，显示了他厚重豁达的性格内涵和人格修养。

（作者系著名美术理论家）



《辉煌伟业》

曹元升作